

文化遗传基因与生命本相体悟

关于『康定七箭』(上)

◎丹珍卓

壹

文学作为想象的空间,自身就是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。文学空间中弥漫着自然脉息、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。康巴地区地貌多崇山峻岭和高山峡谷,历来又是汉藏文化的接合部,并处于“藏彝民族文化走廊”的集合点上,是“内地的边疆”,又是“边疆的内地”,藏汉文化在此交汇、融合。在经济方式上,康巴地区处于“农耕文化”与“游牧文化”的交接地带。康区藏族的族源构成、宗教派别、语言使用、文化传承等各方面,充分体现了“过渡地带”的杂糅与多元。不同民族文化(汉、藏、彝、纳西、回)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是康区文化的基本特色。从文化空间的角度看,康巴文化处在汉民族文化、藏族文化、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接壤地带,实际也是多种文化的一个“中间状态”。笔者曾多次论及康巴地区的文学创作,在总体上呈现出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杂糅特点。但是,我们同样能够明显感受到来自于“游牧文化”与“农耕文化”交接地带的精神文化特质,有来自远古藏族的原始宗教精神,以及佛教文化因素、藏传佛教文化、格萨尔史诗文化等等。宗教情感与英雄崇拜情结相互交织,相互转化。“现代化”和“异质文化”的冲击与影响,使得康区民族文化意识、本土文化意识被进一步凸显、强化。文化“过渡地带”上的“杂语喧哗”,显示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文学表达的张力。这个地理文化空间显然是需要作为一个“社会、文化、地域”的多维存在来进行考察。

康区藏族基本上是以当地原有的众多氏、羌、彝等众多民族成分为主体,在不断受到吐蕃藏文化融合与同化的基础上形成的。康巴地区历史以来远离藏、汉文化的中心地带,处于边缘的非主流地带。但在跌宕起伏的民族历史进程中,康巴藏人对于自身情感的文学表达从未停止过,特别是口头文学积淀深厚,绵延传承,至今不绝。“康定七箭”等藏族作家大多出生、成长于这片土地,亘古常新的民间话语及其本土文化,弥漫着可贵的生存活力与生活的原汁原味,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厚土壤,对塑造族群文化身份意义深远。他们虽然不能用藏文书写,只能用汉语写藏人的生活,用汉语表达他们对自然、对神性、对人性、对信仰的感知与体悟,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始终与康区文化传承、

民间话语传统以及经验方式密切相关,并表现出对族群性、地方性因素的超越。我们看到列美平措诗行中的“生命原色”,就沉淀在他朝圣途中对生命真谛的体验:

随着血液渗入生命更深的地方
我逐渐知道祖先图腾的意义了
就像鲜血滴在羊皮上的显影
我沉浸于高原纯真的柔情
微风抚慰 湛蓝如海的天空下
羊群如波浪般涌流而去
这时候 牦牛坚定的步子
在草地在雪山上走过
作为图腾它当之无愧
在它健壮躯体庇护下的土地
生存着更加坚韧执拗的人民
我行走高原久远的腹地
白昼的寂寞胜过更加漫长的夜晚
我面部之上缺少了的热情
不断流淌在并不宽阔的胸膛
……

文学发生地的地理文化空间对于每一个作家、诗人及其作品来说,都具有文学发生学意义。在某种程度上,地理自然环境对作家诗人心灵世界的建构甚至超过了人文历史。地理是文学的骨架。一个作家童年和少年时代所生活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日后的创作,往往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,如作家的气质个性、思维习惯、文化心理、认知方式、创作心理、情感表达,文学的构成与演变,作品的美学建构等等。其次,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山水环境的描写,往往能够体现出作家本人的审美情趣、审美态度与审美个性。由此可以进一步解读作品的思想价值与美学意义。从本质上说,文学作品所建构的都是想象的空间,而作品中的自然山水表达的都是作家的心理意象,是作家的情感符号,或者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符号。文学地理空间涉及作家诗人的出生地、移居地以及地域文化、民族文化、作家的人生轨迹、文化中心转移等问题。这些因素往往是在相互交织中产生综合效应,而地理空间和文化基因皆构成其创作的基础性因素。

“康定七箭”之一的格绒追美从小就喜欢听格萨尔史诗说唱,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语言时说道:“数千年来,从祖先嘴里流淌出的是山泉、珍珠般充满诗意的语言。这语言据说得到过神灵的加持,充满了弹性、灵动,如珠玉扑簌,似鲜花缤纷,常常让人心醉神迷。特别是说唱雄狮大王格萨尔王的

传奇故事时,那语言的魔性像一片云雾罩在你整个身心之上,使你飘忽在神乐的云烟中。”尹向东的短篇小说《草原》中,“在牛场与牛场之间四处漂泊,靠说唱乞讨维持生计”的牛场大名人“索”,“流浪到哪里,人们一如既往地欢迎他来,听他说唱格萨尔,听他把各处的见闻都加入到说唱中,听完诱人的故事,同时也知晓了四方的新闻……”对创作而言,民间语言文化一直是他们“庞大的素材库”和“巨大的故事与题材资源”,还有一些更直接更有力的方法的启示”。据汉藏史料记载,康巴地区的“岭国”是格萨尔王的诞生之地和开疆拓土的崛起之地。元朝以后,这里已成为康区著名的强大部落,因而元朝以其地置“朵甘思宣慰使司都元帅府”,由岭藏族世袭为宣慰使。明初,朝廷在岭藏族所在地的俄支设朵甘卫指挥使司。洪武七年(1374年)升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,仍由岭藏族世袭为都指挥使。此外,还封岭藏族僧人为“赞善王”。由此使得岭藏族成为康区最为显赫的土司。除《明史》《明实录》有明确记载外,甘孜德格档案馆还保存有明代敕封岭藏土司的诰敕等文物。这里是家喻户晓的格萨尔王诞生地,是脸炙人口的英雄史诗重要的传承区域,在这里产生格绒追美的小说《隐蔽的脸:藏地神子秘踪》,达真四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康巴》,还有《命定》等这样“史诗化”的“大叙事”作品,似乎是自然而然,不足为奇的。气势磅礴的历史背景,普通人的命运故事,穿越时空的“神子”,常人无法得知的神秘真相,种种逼真而又神奇的传说……宏阔、大气、凝重。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绕登、朗忠、桑根、贡布、绒巴、多吉顿珠、松吉诺布、嘎斯切、索……都是原生地本土化特征的康巴汉子形象,似乎是作者信手拈来的,但却是文化遗传血脉命定的,在作者的笔下,英雄格萨尔王的后代——康巴儿女的快意恩仇、敢爱敢恨表达得自然真实,呼之欲出。列美平措说,让我们“聆听祖先重负下的鼻息”“同唱那首颂扬英雄的赞歌,而不必考虑怎样表达情感”。

康巴地区虽然地处边缘地带,文化上也从未居于中心或主流位置。然而正因为远离中心、地处边角,古老原始的藏族文化在这里躲过纷争得以传承和保留。尽管藏族早已与佛教融合,但藏族的诸多文化基因、思维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,一直传承至

今。煨桑、占卜、攘灾、祈雨、防雹、跳神等仍然是康区民众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,尽管其中有许多东西已经与佛教揉合在一起,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存在,藏族依然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。有学者认为,康巴地区的藏族是古老原始藏教的“活化石”。当然,藏族民间对藏教的信仰并不仅仅局限于康巴地区、川西北的嘉绒地区,青海、甘南、云南和西藏等大多数藏区,尤其在更为偏远的青藏高原民间,除了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外,以个体宗教职业者(“茶苯子”“哈瓦”等)为载体的民间信仰其实非常普遍,依然活跃。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自然宗教,文化遗产在内容和形式上,一直处在并行不悖的多层次互动关系中。如果我们将藏教的信仰对象、民俗禁忌、巫术仪式与作家文本中的许多巫术描写进行对比,就可发现其民间文化精神体系的深层心理对接。如格绒追美《隐蔽的脸:藏地神子秘踪》第二部“风云”篇中,绕登和赤烈夏超从“央”(福运)箱里安放白石举行“地庆”祭祀仪式的大段描写,虎措、绒登活佛的“法曲”“预言”,雅格喇喇喇擅长的各种巫术……等等。尹向东《牧场人物小辑》中的“索”与“新鲜牛血牛肉”之间复杂的象征、隐喻,以及背后隐匿的民俗心理、人性张力等等。藏族有许多操作性很强的巫术仪式,如:通过占卜预测吉凶祸福;通过祈祷、祭祀聚财或引福;施放咒术,超度亡灵,祈雨驱邪、攘灾招魂、呼风唤雨、作法弄神等等,在藏区历史上或民俗生活中屡见不鲜,其中渗透着藏族神巫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思维习惯。这些巫术仪式、原始藏族文化,在“康定七箭”的作品中随处可见,俯拾即是,几乎构成了一幅康巴民俗文化图景。比如青藏高原因为冰雹灾害频繁,防雹驱雹巫术就成为重要的民俗事项。马长春先生在《茶教源流》中指出:“阻止冰雹之事,非高明茶僧不为功。凡冰雹厉行之寨,寨民派粮供奉一茶僧。春秋之际,风雹为厉,此僧则于寨外山顶设坛作法,或登高山而啸。空中之密云则为之散,谷内之风则为之息。”无论是源自可见,还是源于生活,艺术的浪漫和生活的心理体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统一。就文学创作而言,这种独特的神圣性和世俗性,都是对一类心灵世界以及文学想象力的无限延展。

贰

禁忌,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每个民族的文化生活或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禁忌习俗。禁忌也是各民族各地域区别于他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。禁忌几乎体现在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,如藏族禁忌伤害鹰、狗等,“割肉喂鹰”“以身饲鹰”的佛教故事几乎家喻户晓。在更古老的藏族民间神话和藏族的神灵系统中,鹰具有特殊的地位。西藏林芝地区本山上有一座古老的茶教寺庙色迦更钦寺(又称大神鹰寺),每年藏历4月13—15日,是寺庙传统节日“泊尔节”——就是敬拜神鹰的祭祀日。这些禁忌民俗自然也经常出现在作家的文学作品中,他们的文本创作中。

尹向东的小说《鱼的声音》讲述了22岁的汉族青年苏医生在阿坝草原上的一次钓鱼经历。这次关乎民俗禁忌的钓鱼经历给苏医生留下了长达10年的心理阴影。初到高原,苏医生正值青春岁月,草原生活的新鲜期过后,他的生活开始经历诸多的不适应。他得知阿坝草原的河流里鱼特别多,便很快迷上了垂钓。一天下午,正当他钓鱼“硕果累累”时,两个骑马的牧民从远处走来。“壮实的汉子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钓鱼竿,掰成两段,狠狠扔向对面,又蹿到河边,将浸在水里的塑料袋撩底翻起,鱼哗啦啦跌入水里。汉子转过头时,苏医生看见他的双眼红了,眼白里突然涌现的红血丝显示出汉子的愤怒,他原本英武的面庞这一刻变得极为狰狞,也不知他高声骂了句什么,猛冲过来,一掌将苏医生推倒在地,他紧攥双拳,苏医生

的心跳加快,感觉心就要蹦出嗓子眼儿。”故事主题关乎饮食禁忌的深层,展示的是一种民俗禁忌文化心理的差异。西藏和涉藏地区很多地方忌讳吃鱼。食鱼的禁忌与藏族“鲁”神系统相关,禁忌原因:一是与藏族“三分世界”的认识论有关。藏族视鱼、蛇、蛙等水中生灵为“龙族”,认为它们是地下世界的神灵——这些动物被归入藏教的“鲁”神系统中。二是与藏族一些地区的水葬习俗有关。未成年的孩子和家里饲养的牲畜死后,往往采用水葬,让水和鱼消解死去灵魂的躯壳。所以很多地方不捕鱼,也不食鱼。三是与藏族传统的宗教观念,祭祀仪式有关。巫师在举行传统的驱鬼和祛除其他不洁之物的仪式上,总要对那些四处作祟的东西加以诅咒,然后,再将其从陆地、居所或心灵深处驱逐到水里。于是,水里的鱼便成了这些不洁之物的民众绝对不捕鱼、不食鱼。

尹向东的另一短篇小说《草原》中,在贡玛草原工作了30年的汉族警察罗寅初,一直被草原上的人们用浓重的藏语强调叫他“洛彭措”,连他自己也“渐渐地忘掉了自己的本名”,“除了适应这个名字,他还适应了许多”。一年后,他能和大家用藏语交流了。爱吃鱼的他,刚开始并不明白这里的小溪中为什么有大量的鱼,藏族人不吃鱼是洛彭措后来才知道的。

“直到有一天,他想去弄点鱼,刚有这想法,就有牧民送了鱼来,他高兴坏了,拉住别人攀谈,当面拿剪刀剖鱼,当那牧民看见被剖的鱼时,立即大张了嘴,惨叫一声满脸惶恐地跑掉了。这时,他才发觉事情有那么点儿不对劲,细细打听之后,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,也明白了牧民给他送鱼时心里的那份沉重,眼里又潮潮的,满脑袋都是那牧民惊恐的表情,至此,他再也吃不下鱼了,无论去哪里,看见了盆里的鱼,那牧民的形象就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”

《鱼》的短篇小说,阿来也有两篇同名。其中一篇就是“我”的第一次钓鱼成了一种心理的历险,一场无声的战斗,对手是“我”内心世界中的两个自我。作者细腻地描述了一幅幕人心悸的复杂心理感受。对食鱼的民族生活情趣,而对于“我”这个藏族人的,则是一次心灵的冒险。小说的结尾处,钓鱼的经历并没有使“我”获得什么愉悦感,而是在风雨过后的草滩上“痛痛快快地以别人无从知晓、连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的方式痛哭了一场”。尹向东的还有一篇小说《牧场人物小辑》,“索”喜欢吃“新鲜牛血牛肉”,但种种事件的发生,让“索”最终吃出来了“负罪感”:

“他不再想新鲜的牛血牛肉,现在他脑子里成天想着看阿喷喷心痛的模样,那形象像与生俱来长在他的脑袋里,不由他不想,这个形象一出现,他就感觉头疼,最初那疼还不太明显,钝钝地隐隐地像整个大脑的背景,后来越来越痛,整个脑袋像要爆裂,脑袋里有一条条虫子肆无忌惮地爬动着,无所不至。头疼的厉害时,索就紧咬了牙根去撞岩石,撞了左边撞右边,延缓时间。头撞了两年时间,他也在岩石上整整撞了两年,两年后他的牙根都咬萎缩了,头两侧撞出两个高高的老茧,很明显地塑在那里,牧民们说真是报应,吃牛肉吃得这一世就轮回变牛了……”

显然作者对生活现实有精微的观察,对民族文化心理有深刻体验。藏族当代优秀的短篇小说并不多,短篇小说的写作有它自身独有的艺术难度。核心是细节,而非情节,需要作者以细节来推动叙事。短的篇幅里,同样可以隐含广大的人生,探究生命的本相。果戈里的短篇小说《涅瓦大街》,通过涅瓦大街上沿街乞讨的乞丐、蓄着绅士短髯的男人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、衣衫褴褛央求路人的老婆婆……将彼得堡贵族官僚的虚伪生活描绘的入木三分。鲁迅先生的《孔乙己》寥寥数字写活了“站着喝酒而穿长衫”的孔乙己。尹向东的短篇小说完全不同于一个好的故事横切面,短而有味,意犹未尽。《草原》里的洛彭措和索,一个警察和一个盗贼的故事;《牧场人物小辑》中“索”的故事,看似平平淡淡的从容叙述,却隐藏着难以掩饰的玄机。那些平凡甚至卑微视角下的人性瞬间,尤其对乡土伦理的细微描写,充满对生命世界混沌与清明的敏锐发现,对生命虚无和空洞真相的透视,写出了形而上的生死之间,人性的困境和对生命本质的体悟。

